

# 陳特 || 古今、中外、「文」「學」之間

原創 陳特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4月8日

## 古今、中外、「文」「學」之間

——論《談藝錄》與錢鍾書文學研究之「特立獨行」

### 一、引言：評價的多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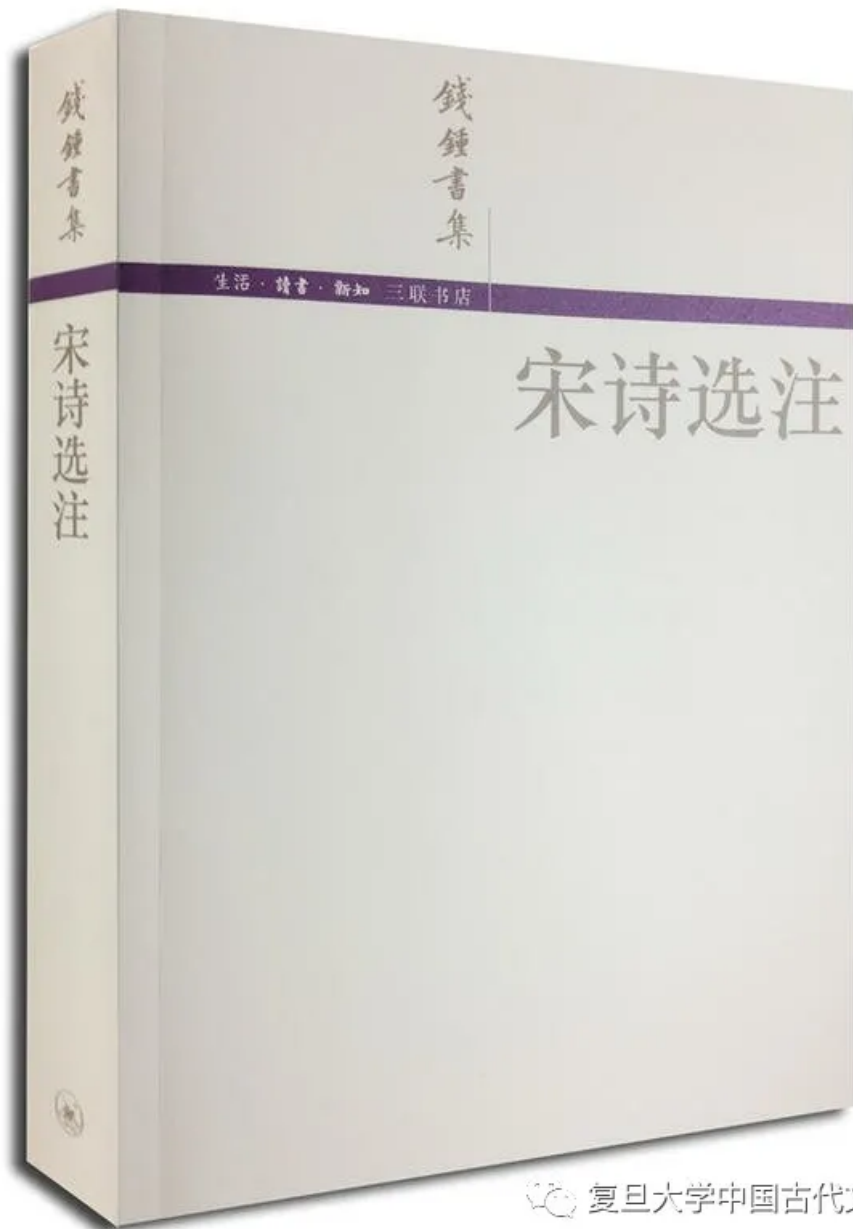
儘管在世俗和學界都享有巨大聲譽，錢鍾書先生卻似乎從未得到一致的評價，而且隨着錢氏中外文手稿的陸續出版，對他的「再」評價恐怕會一直進行，而這不斷進行中的評價似乎也沒有走向一致的趨勢（這其實與新材料的出現沒有太大的關係，詳後）。

雖曰「蓋棺論定」，但恐怕沒有哪位大學者會獲得高度一致的認識，越是有意義的學者，在後人與其不斷「對話」的過程中，其為人為學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越容易受到挖掘。但是，錢先生生前身後獲得的多歧的評價，卻比較特殊。特殊之處就在於，同時和後來的論者，對他的評價在大判斷上就有歧異。不妨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同樣在世俗和學界享有隆譽的王國維、陳寅恪稍作對比。近二十餘年，對王、陳的傳記和學術史研究，並不比對錢鍾書的相關研究「寂寞」（只是相關研究者沒有聲勢浩大地打出「觀堂學」或「義寧學」的旗號，不若「錢學」易於宣傳），但與這兩位學者相關的爭論，大多發生在細部或中等層面上，[1]但對王、陳在文學研究、史學研究和古文字文獻研究上的價值，今之學人基本給出很高評價。而有關錢氏之評價則不然，褒揚者譽其為「文化崑崙」，否定者則在微觀宏觀各個層面皆有所否定，這些否定中，固然有妄人的隨意臧否，卻也有不少屬於今日之優秀研究者與錢先生的嚴肅「對話」，從這些不同層面的嚴肅的否定意見入手，或許能看出錢氏文學研究的特異之處。

在唐詩和清詩、詩學研究上造詣極深的蔣寅，因為關心領域與錢氏《談藝錄》多有重合之處，對錢氏的學問也頗有會心之處。在錢先生尚在世之時，他便曾專門撰文評述錢之為學。[2]一方面，蔣寅對錢之成就評價很高，且能恰當地指出錢氏之學好在何處；[3]另一方面，他對錢鍾書的高度評價始終保留在一定限度之內，他強調「錢鍾書的所成，要在一個學字」，[4]顯然，在「學」之外將錢氏全方位地拔高，是他所不取的。而即使在「學」這一限度之內，蔣寅也認為「錢鍾書還不能說是個大師，而只宣稱為博學家呢」，因為「博學家以對知識的開拓興趣為旨歸，而大師從來以天下為己任，奪田一句士語，就且捕

對知識的單純興趣為目的，而人即從不以人下為己任。吾輩一己之學，祇是守學家之學為己，大師之學為人」。其實，蔣寅還推測「從動機來說，錢鍾書也許並不想做個職業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因為錢「本無意於研究問題，你用研究問題來要求他，就未免太認真了」。所以，在蔣寅看來，錢鍾書「真正是個玩學問的人」，他的境界「可以景仰，卻難以企及」。[5]

著作等身的龔鵬程自承深受錢鍾書影響，又自認是當世有資格評價錢鍾書的少數人之一。作為睥睨一世的當代奇人，龔鵬程著有專文，將錢鍾書放在二十世紀學術研究的大背景下加以討論。[6]龔氏對錢鍾書的評價，同樣重在指出錢的限度。龔氏首先借着對《宋詩選注》的批評，指出了錢鍾書宋詩研究的若干「偏見」[7]，依託這一事例，龔氏進一步指出「錢先生學問上的幾個問題」[8]，進行了這兩層論述後，龔氏作了他對錢鍾書的大判斷：「大判斷甚少，或竟皆是錯的，我以為乃是錢先生之缺點所在。另一個大問題，則在於錢先生論學往往顯得『不當行』。」[9]



龔鵬程這一大判斷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錢鍾書論學不能作大判斷，甚少的大判斷中多有錯訛；二是錢鍾書論學「不當行」。前一方面，雖然龔鵬程用較長篇幅列舉了若干例子（主要來自《宋詩選註》和〈中國詩與中國畫〉）加以佐證，但就錢鍾書的宋詩研究而言，龔鵬程所舉的例子固然有所依據，但他僅僅依照《宋詩選註》對錢鍾書的宋詩研究作出綜合判斷，甚至據此認為錢「並沒有發展出一個自己真正對宋詩的整體觀點」，卻頗為失當。首先，《宋詩選註》是集體項目中的一部分，體例方面頗受限制；其次，《宋詩選註》在撰作、出版時面對特殊的政治環境，錢在該書〈序〉中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好，在書中多選具有「人民性」的篇目也好，都帶有迎合主流以「避禍」的味道，而錢在《選註》中刻意崇唐貶宋，與毛澤東個人在詩歌欣賞上的強烈好惡也是有一定關係的。[10]雖然錢有意迎合主流，但在引用〈講話〉時，所引之言卻是帶有普遍正確性的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唯一的源泉」的說法；[11]而在選取富於「人民性」的詩篇時，也努力選出這些詩篇裡藝術性較高的篇目，這些較為隱微的作法，都可以視作錢鍾書在主流壓力之下對文學自身標準的堅持。[12]至於龔鵬程對〈中國詩與中國畫〉的批評，則包含了不少誤讀，張隆溪對此已有專門駁正。[13]因此，龔氏所謂「甚少」的大判斷「皆是錯的」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但其「大判斷甚少」的說法，確實反映了錢鍾書論學的一個面向，這是其他論者也普遍注意到的，前文已引蔣寅論錢鍾書「本無意於研究問題」，既然連「問題」都無意研究，自然不會用心於作大判斷。而「不當行」，在龔鵬程的語境下，指的是錢氏在「經學、史學、小學、諸子學、哲學」諸領域「均不當行」，「惟穿穴集部、縱論文學，乃其當行本色，彼亦以此點染四部耳」，[14]這一觀察可稱銳利（詳後）。

在學術領域，如龔鵬程這般的負面意見已屬嚴苛，但還有一種批評較為常見，那就是在學術的深度和思想性上對錢鍾書提出質疑。這方面劉再復的意見頗具代表性，在與李澤厚的對談中，劉再復將錢鍾書的著作比作「大礦藏」，錢「用全部生命建構礦山，把開掘的使命留給後人」，而與其對談的李澤厚，自然要發揮其「思想家的特長」，「在可開掘思想的關鍵之處深錐下去」。[15]這一評價，顯然是認為錢鍾書之論學，雖有廣泛的材料積累，卻未在可開掘思想的地方深入發掘思想。劉再復的這一「不夠深」的判斷，與龔鵬程的「不當行」可以代表對錢鍾書否定的兩個主要方面，而他的這一並不十分嚴肅且帶有幾分詼諧的論說同樣受到了張隆溪嚴肅而辛辣的反駁。[16]

上述各家對錢鍾書的評價，各自有不同的關懷重點，對其否定性的意見也有深淺之別，不過總體上還是承認錢之研究是有意義的，只是對意義有多「大」意見不一（這背後其實是各家對學術研究的意義的體認不同）。而西學修養精湛的劉皓明對錢鍾書的批評，則比上述各家更進一步，他將錢鍾書比作「卡夫卡的絕食藝人（Hungerkünstler）」，並強調他的這一比擬「同時也是建立在概念和分析上的事實陳述」，他認為錢鍾書只是在賣弄技藝（而且只

是「雜耍」式的技藝），不關懷文本的「意義」（這和劉再復所謂的沒有開掘「思想」較為類似，只是劉皓明更善於使用華麗的西學概念加以點染），故而他認為錢鍾書的為學乃是一種「反文化現象」，錢鍾書具有「非文化本質」，這種「非文化本質」則來源於「意識的缺乏」。在對錢鍾書作了如此嚴厲的批判後，劉皓明還為錢鍾書尋得了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他將錢鍾書與沈復加以類比，指出他們的相似之處，進而將錢鍾書安置在一個「缺乏意識」的譜系之中。[17]劉皓明的評價帶有強烈的德國哲學背景，他所念茲在茲的「意義」和「意識」，比劉再復所謂的「思想」要狹義，所以在他看來，錢鍾書的研究不僅「不夠深」，根本乃是「未入流」。

從褒揚為主的蔣寅，到嚴厲批判的劉皓明，我們可以看到，對錢鍾書的評價，「多歧」主要來自於價值判斷層面。在事實陳說層面，論者都認識到錢鍾書擁有人所難及的廣博，而與這種廣博相聯繫的零散無體系，也基本被眾人接受。依據大致相似的事實得出的價值判斷，卻言人人殊：在蔣寅看來，錢的研究是比較有價值的（雖然也有問題）；在龔鵬程和劉再復看來，錢的價值雖然有，卻不大，至少不若龔本人或李澤厚大（雖然錢讀書比他們多）；在劉皓明看來，即使錢鍾書讀書再多，他的研究仍然是沒有意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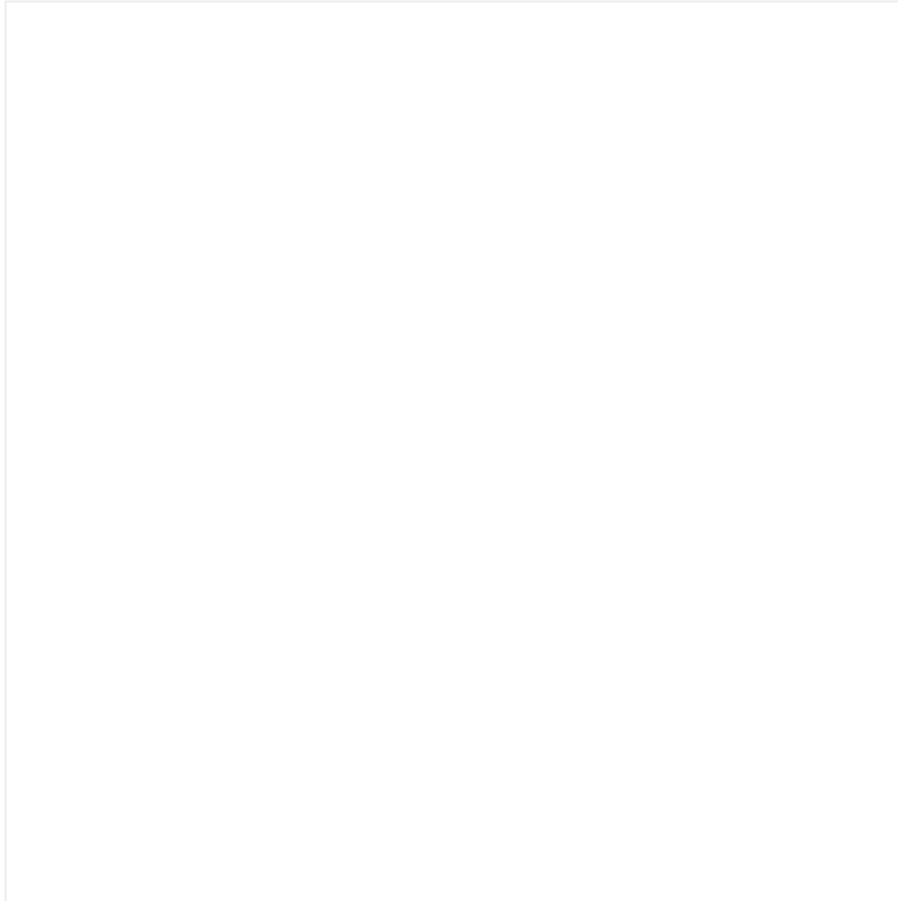
對錢鍾書的評價的多歧，到最後實際關乎意義的追問：到底怎樣學術研究才是有意義的？意義的標準又應當是什麼？

## 二、以「文」為「本」

作為學問家的錢鍾書，主要研究什麼學問？這一關於錢鍾書為學的基本問題就存在不同的解答，部分愛「錢」甚深的「錢學家」認為錢鍾書為學的範圍無所不包，涉及人文領域的方方面面。媒體愛用「文化崑崙」稱譽錢，所謂「崑崙」，多少指向包羅萬象；但如果不因錢鍾書在論學時採用了某一學科範疇的材料，就認為他的學問包含了這一範疇（這正是很多愛「錢」者採取的辦法），而採取若干客觀的標準加以判斷，並以現代學科概念加以判分，那麼錢鍾書的為學，主要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

這裡所謂的「客觀的標準」，指的是從學經歷、工作經歷以及專著論文的主要內容。錢先生在清華大學和牛津大學所讀系科都屬「文學」範疇，[18]在上海、昆明、藍田、北京等地從事的教學研究工作，也都限於文學範圍。而錢先生在「文革」結束前唯一的學術專書《談藝錄》，所談之「藝」，就是「詩藝」。《談藝錄》不僅襲用了徐禎卿談「詩理」之書的書名，而且直接採用了「詩話」這一「論文說詩」的傳統形式，[19]這自然也完全在文學研究的範疇之中。據說，在《管錐編》出版前，錢先生在社科院的相關表格上，填寫「學術專長」時，所寫的是「文學」，在《管錐編》出版之後，則填上了「文學、史學、哲學」。設若錢先生自己這樣定位，那麼「文學」無疑也是他關懷時間最久的領域，所以，將錢鍾書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定在文學研究上，應該是比

取人的領域，所以，將錢鍾書子附明九的「文」領域定在「文學」上，應該比較妥帖的。



明確了錢先生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再來重看上述多歧的評價，可以發現，衆多高明的學者在評價錢鍾書時，根據差別不大的事實理解，卻得出差異甚大的結論，這與「文學研究」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不確定的位置大有關係。

雖然我們素來說中國古人乃是「文史哲不分家」[20]，不過，渾而不分恐怕是東西方早期人文的共同特點，隨着「文」與「學」、「學」與「術」的發展，「不分」遲早要走向分裂。就中國傳統的情況來說，至少在北宋，與現代意義上的「文史哲」的分科相類似的分裂已經出現了，這一分裂，宋元之際的劉勳在《隱居通義》中用「周程、歐蘇之裂」加以概括，如果放在「古文運動」的大背景下加以檢視，劉勳的概括強調了宋代開始「文」和「道」的分離。周程自然也是注意「文」的；歐蘇更是十分重視「道」，故而要在道學家和古文家留下來的文字中找出道學家注意「文」或古文家推重「道」的文字，自然十分容易，但一個簡單的事實足以提醒我們，宋代及之後的讀書人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分裂」，這個事實就是：作為北宋最重要的文人士大夫，蘇軾關於經學的論著（如《論語說》）並未得到有序的傳承，需要今人輯佚；而蘇軾的詩文集，儘管北宋後期黨禁中被禁，卻仍然代有流傳。

「文」和「道」的分裂，按照今天的概念，相當於文學和思想的分裂。不過，思想既可以通過學術，也可以通過文學來表述（只是宋代周程一系的理學家的那一套表述，已經頗為接近現代人意識中的「哲學」）。和「文」相對應

的一個比較恰當的範疇，應該是「學」。而「文學」和「學術」的分裂，在宋代也已經頗為明顯，理學家的思想表述之外，宋代的史學已經具有很強的獨立價值，士人完全可以以史學名家並以此自矜，如司馬光、劉邠等。[21]宋代以後，隨着時間的推移，能夠兼善「文」和「學」的讀書人似乎越來越少，這是分裂和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趨勢，到了距離現代最近的清代，更為明顯，義理、考據、詞章的三分，使得清代的讀書人，多少要在「學人」和「文人」之間徘徊去取。[22]而清代「道問學」之風興盛，「智識主義」使得學術高度發達且有持續發展，[23]這也讓現代學者覺得，中國之「學」走向現代學術，多少有些水到渠成。[24]

不過，在傳統學問走向現代學科的過程中，「文學」的位置頗為尷尬，在「文」「學」分裂的傳統形勢下，文學是一種技能，而非客觀知識。選擇作文人，就要能作詩文；而學者的關懷，往往少涉集部。但到了現代，科舉廢除，白話取代文言，諸種大變，使得「文學」不再是讀書人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文學開始由技能轉向知識，文學需要被研究。那麼，文學又需要如何被研究呢？這時候，一方面，舊有的已經比較成熟的相關學科門類的研究，必然會對不那麼成熟的文學研究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研究」本身的特點和規定性，也會對文學研究有所限定。清代考證學極為發達，[25]清代學者運用考證學的辦法，在經學、史學以及子學上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考證學的特點是追求客觀和確定，而這恰恰是「研究」所需要的（所以上述兩方面其實是統一的，比較發達的學科之所以發達，就是因為其主要方法與「研究」的規定性有較高的相關度）。而客觀和確定的追求，又恰與西潮中最迷人的「科學」接近。於是，在人文學術現代化的進程中，最易於實施考證手段，也最能達成客觀和確定的史學，便在整個二十世紀人文學術[26]中獨大並將其影響力覆蓋到週邊學科。[27]在文學研究中，文學史這一領域和考證這一手段便佔有了崇高的地位。[28]

這便是錢鍾書面臨的文學研究之大勢，錢鍾書的文人家庭背景和所接受的基礎教育使他具備了傳統文人的能力和趣味，他能寫很漂亮的古詩文，而且在寫作古詩文時對某些流派有自覺的歸依，文學對他而言是一項技能。但他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從事的工作，以及個人的才性，都使得他更偏於學者而非文人。作為一個接受了完整現代教育的文學研究者，錢鍾書卻對上述偏於史學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研究的考據化[29]持堅定而激烈的抵抗態度。

錢先生在這方面的特異，已經引起討論者廣泛的注意，這裡僅引兩處廣為人知的錢氏刻薄語，對他的抵抗略加說明。

在三十年代所寫的短文〈釋文盲〉中，錢先生故意將「文」釋為「文學」，將文盲釋為不能領略文學價值的「價值盲」，大大嘲諷了一通不懂得欣賞文學，「欠缺美感」，只對文學作品進行語文研究的「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他甚至尖刻地說：

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裡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能力！[30]

這樣的意見，在幾十年後，他依舊堅守，在1978年所作的〈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31]中，對於文學研究中清代的「樸學」的影響，他還是多有否定。同時，錢先生還不點名地對陳寅恪加以諷刺：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菸？」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32]

這段話針對的自然就是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開頭部分對楊貴妃是否以處子身份入宮的考證，而且錢先生似乎不止一次或明或暗地對陳寅恪有所批評，[33]不過此處的諷刺和批評顯然是不公平的，陳寅恪在考證這一「小問題」時，有他對唐史的大判斷和大關懷在背後，余英時就認為，陳氏對這一問題的考辨「是爲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34]雖然沒有切實證據，但我以爲，陳氏之考證與論說如此顯豁，錢先生不會不察，我更願意將錢在此處的諷刺理解爲他對於以詩歌證史，只將詩歌作爲考辨史事的材料的不滿。[35]這種不滿，在剛剛「解凍」的特殊時期，又面對外國學者，可能有些誇張的發揮。

以上兩個例子，體現了錢先生對小學研究和史學研究「入侵」文學研究領域一以貫之的拒斥，這在現代學者的文學研究中，實在是特立獨行。但如果錢先生只有拒斥，只有「破」的一面，而不能在考證學方法之外，在史學化、小學化的文學研究之外有所「立」，那麼他也只是一個奇特的否定家而已。

幸而在「破」之外，錢先生在文學研究上多有「立」之建樹。他對文學有自家的定義，有一套完足的文學觀。刊發於《國風》雜誌第三卷第八期、十一期（1933年10月16日、12月1日）上的〈中國文學小史序論〉，[36]「比較集中體現了錢鍾書先生的文學觀和中國文學史觀」。[37]錢先生用「功用」來界定文學，認為文學應能「移情動魄」。「功能的感人」之外，錢先生還用「美感之有無」來界定文學，合乎「動人」和「美感」的，才是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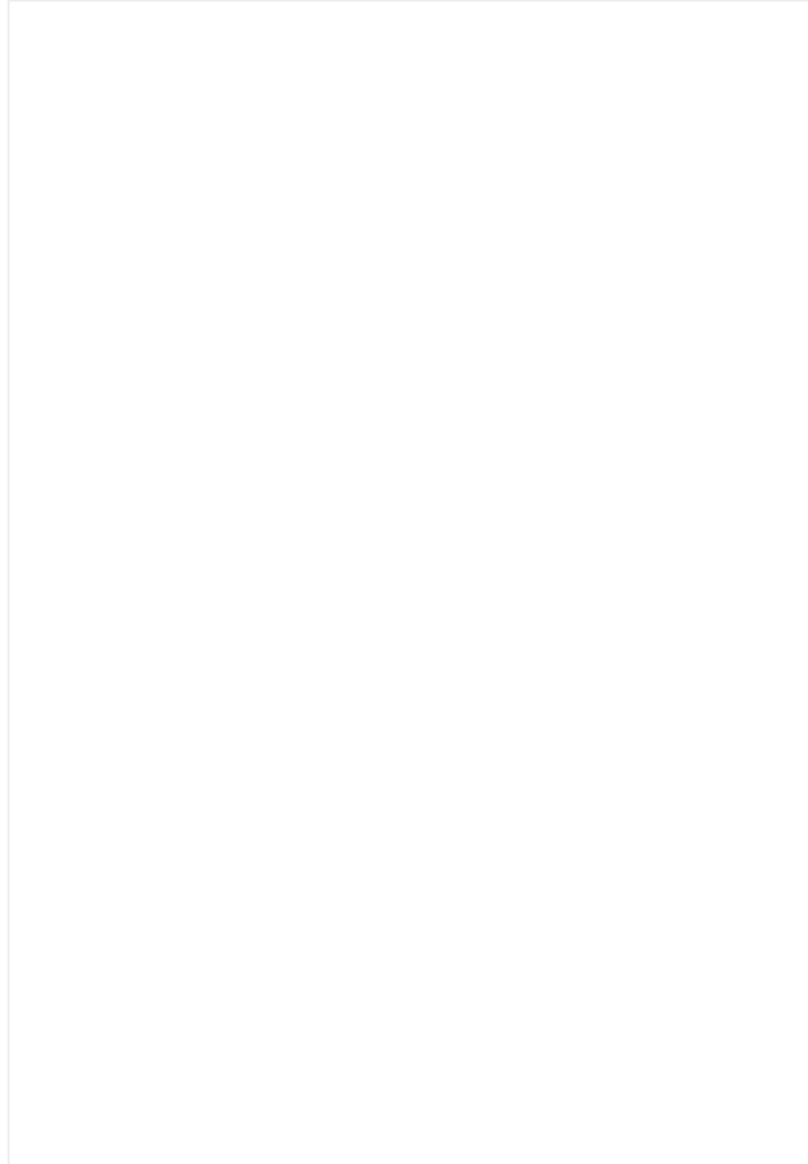
既然有這樣的文學觀，那麼與之對應的文學研究，自然應該着力於發掘文學的「動人」之處與「美感」，或者依憑着這樣的標準，來敘述文學史，進行文學批評。[38]即使是在錢氏自己界定的較爲客觀的文學史研究中，作家生平的傳記研究，也不再是最重要的，影響才是關鍵，而影響之判斷，文字的陳述和記錄固然重要，直接從文本到文本，根據文辭進行判斷，也不可或缺。[39]

這樣的文學觀，使得在錢鍾書文學研究的基本單位只能是文本，外在於文本的時代特徵、作家生平，都應當是爲讀解文本服務的，這在《談藝錄》之開篇便開宗明義地宣示了出來。

錢先生的專書（《談藝錄》、《管錐編》）皆爲筆記體，各條目的排列看

似隨息，但我以為一言之內備自由於下有的刻息又非，總有下有的獨付用心。

[40]《談藝錄》開篇之「詩分唐宋」，是錢先生論學文字中不甚多的宏觀論述篇目（也即龔鵬程所謂的「大判斷」），這篇論說頗有些轉折，舉其大者而言，可以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論不能據王朝時代來判分文學；[41]第二部分主要以王世貞為例，指出即使是個別詩人，本身也會有變化，不能據詩人來判分文學。[42]既然時代不足據，詩人不足據，那麼唯有「文本」足據。



而文本的背後，乃是人之「性情」，「性情」則有常有變。[43]如果追求客觀，那麼「性情」的「變運」就容易被研究者忽視，而這種「變運」，最是微妙。把握文本背後那會「變運」的「性情」，只能依靠研究者自身對文本的賞鑑和體悟。

當然，考證是可以幫助研究者的賞鑑和體悟的，所以錢先生一方面拒斥文學研究的考據化，另一方面卻不排斥考證這一輔助手段，他對考據家的著作毫不陌生，對他們考證的成果或借鑑或修正，[44]甚至自己還會親自動手。「親自動手」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談藝錄》的第二則。「詩分唐宋」之後，便是一則篇幅極長、頗顯樸學家本色的「黃山谷詩補註」，其中蘊含了不少精確的



考證。錢先生在此處對山谷詩的用心箋註，是否是在宣示他對與文學相關的考證「非不能也」？又是否在提醒我們，對於考證的意義，他是完全瞭然於心的，只是考證在文學研究中，必須居於輔助性地位，對文本本身的賞鑑體悟，方是第一位的。

用賞鑑、體悟的方法來應對一個個具體的文本，也使得錢先生的研究必然出現零散的面貌，因為不同文本總是各具面貌，往往不易統一，那麼乾脆就用零散的方式呈現，[45]且不大依靠邏輯，主要依靠涵泳的賞鑑、體悟的方法。這也使得錢先生的論述只能呈現出「有材料有結論，惟獨缺少分析、論證過程」[46]的面貌。

依靠這種辦法，錢先生也解決了不少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問題，作出了許多精彩論斷，不過這些解決的問題和作出的論斷大多只是微觀和中等層面的，如對中國古代山水文學（錢稱之為「詩文之及山水者」）的歷史分期和概述。[47]而極少宏觀的大論斷，正與錢先生的治學方法息息相關。[48]

因應着傳統人文學術的現代轉型，處在古今中西之間的錢先生在文學研究中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路數，那就是以「文」為「本」：「文學」是他研究的「根本」所在；「文本」則是他研究的「基本」單位。

明乎此，再回頭來看上文引述的幾種對錢先生的評價意見，便能發現這些否定意見確實有其合理性，只是這些意見背後的標準，與錢先生自身的學術追求，相去甚遠：所謂「不當行」，那是因為錢先生根本就不想涉足其他行當；所謂「無思想」，如果以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作為思想的標準，如此的思想也的確不是錢先生想要發展的；而所謂「在學術的邊緣上」，更是恰當無比的描述，從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流視角來看，錢先生確在邊緣。

不過，錢鍾書的文學研究雖然在現代的文學研究中特立獨行，卻並非憑空而起，他的以「文」為「本」，不僅淵源有自，而且建立在堅實的觀念之上。

### 三、集部之學與二西之書

上文已經指出，文學（嚴格地來說是傳統詩文）對於錢先生來說，既是知識也是技能，錢先生的文學趣味，也頗為傳統，這從他的文學創作即能看出，且不論其舊詩創作，他的白話小說《圍城》，就很容易讓人想起《儒林外史》。[49]從「文」與「學」分裂的角度來看，「文」主要落實在四部分類中的集部，而學作詩文，更要從集部入手。錢鍾書的家學，正是集部之學，錢父錢基博在1935年2月1日有如下的記敘：

兒子鍾書能承余學，尤喜蒐羅明清兩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隱。發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嘆世有知言，異日得余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繫集部者，董理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之史學以後先照映，非誇語也。[50]

真是知子莫若父，集部確實是錢鍾書浸潤最廣，體悟最深的領域。而在進行現代學術研究時，錢先生也有意選擇了集部的傳統表述方式——「詩話」的形式——來呈現他的學術成果。

詩話一體，創於「歐蘇」之「歐」，本就是「以資談助」之作，[51]閒談掌故之外，詩話歷來是文人揮灑才情、發表創見之所在，所以儘管詩話是關於詩歌的議論，按照今天學術分類，似乎應該屬於學術領域，[52]而在歷來之公私著錄中，詩話都被分類在集部，如《四庫提要》將其歸於集部詩文評類之下。故而「詩話」乃是兼容「文」「學」的一種形式。

而且，錢先生之採用詩話之形式，並非隨意之舉動，《談藝錄》第一則〈詩分唐宋〉之前敘述撰作此書的緣由時，有這樣一段陳述：

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彙成一集。即以詩話為外篇，與之表裏經緯也可。[53]

所謂的「論詩文專篇」，我尚不能確證包含哪些篇目，但錢先生以專篇論文為內篇，以詩話為外篇的設想，可以看出他對論學形式頗為講究。

當然，「《談藝錄》雖貌似詩話，然絕非傳統詩話體所能牢籠，其意要在詮釋、評論，以及疏通、解惑與揭櫫詩文的利病，亦即其自謂志趣在『文藝鑑賞與評判』，即西洋人所謂之『詩藝』（the art of poetry）。」[54]此言誠是，汪氏深刻地指出了《談藝錄》所具備的現代學術品質。不過，談論一本書是否「詩話」，本就是以形式而言，汪氏所謂「非傳統詩話體所能牢籠」，應該從這兩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談藝錄》涉及的材料比傳統「詩話」要廣（採西書）；另一方面，《談藝錄》對詩藝之探討更深入和精微。若回到形式層面，嚴格說來，《談藝錄》並非「貌似詩話」，而「就是」詩話。

採用詩話這一形式之外，上文重點討論的面對文本賞鑑、體悟的辦法，正是傳統集部之學的基本訓練，只是傳統的這種訓練，旨在提升技能，而錢先生將這種訓練的辦法轉化為治學的手段。

在傳統的集部之學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資源，支撐起了錢先生的學術研究，而且給予了他方法論上的基本理念和根本自信，那就是《談藝錄·序》中明確點出的「二西之書」。[55]

錢先生的語言能力無疑是驚人的，他在論著中徵引的外文材料，當世恐怕很難找出一位學者全面審讀，而他原本還計劃在完成《管錐編》後[56]依照《管錐編》的體例和辦法，對若干外文專書展開討論，[57]可惜這些想法並未完全落實。

而錢先生讀外文之書的辦法，亦與他讀集部書之方法無異。至少在出版的論著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對西方文學、學術的整體判斷和評介，外文材料往往是因為與中文材料具備某些相似性而被徵引的，當然，在徵引時，錢先生會對不同材料間的異同加以辨析，這其中往往有許多妙語和灼見，所以他對外文文獻的徵引，「絕非只是把本來引用中文文獻就可以說明的道理，疊牀架屋，引由西方的例證再論明一遍」[58]總體來論，錢先生的「中西交匯」主要還

用讀集部書之法讀西書，在我看來，不僅給錢先生帶來了材料上的廣博，更重要的是，對不同語言文化材料的閱讀，使得錢先生具備了一個強大的理念，那就是《談藝錄·序》中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這個理念，可以說是錢先生為學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從事學問的基本出發點。

法國漢學家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曾經批評錢鍾書，認為他「把一切都看得多多少少是相同的」，這引來了張隆溪的嚴正反駁，[59]在對張隆溪的回應中，于連再次表達了他對錢先生的看法：「錢鍾書教授是一個有廣泛文化修養的人，他的方法是某種尋同的比較主義 (comparatisme de la ressemblance)。」[60]于連並非一位十分推重錢鍾書的學者，不過，他所謂的「尋同」，確實是錢先生文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正因為人的性情有「同」的一面，所以不論性情如何「變運」，我們仍然能夠通過賞鑑、體悟來發掘文本背後的性情。而錢先生在大量的閱讀、歸納、比較之後，一再發現古今中西之人通過文本體現出的思理和性情上的「同」，這又使得他的基本出發點不斷得到夯實。[61]這無疑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也是錢先生學問在不斷豐富的同時又能一以貫之的原因。[62]

其實，正如蔣寅指出的，「誰的文學批評不是同中求異和異中求同」？[63]錢先生的特異之處不在於同中求異和異中求同，而在於他將「同」作為基本出發點，這一出發點又是建基於古今中西浩瀚的文本閱讀之上的。錢先生能夠持有這一「說來容易」的幾本理念，背後是無比困難的「讀書破萬卷」，而浩如煙海的閱讀量，使得這一基點難以被推倒。

#### 四、餘論：學問的輕與重

上文討論了錢鍾書特異的為學背後那簡單的理念和基點，並指出所謂的「簡單」，只是說來而已，若要做到錢之程度，非天資和勤奮並重不可。

儘管做起來甚難，但錢氏著作對於我而言既「難」又「易」：一方面，這些論著（尤其是文言論著）廣博無涯的徵引、簡古的行文讓我屢屢碰壁；另一方面，一旦能夠讀懂部分論著，我就能感受到這難讀的文字背後那個有「趣」的作者。錢先生的論著雖然難讀，卻並不沉重，反而是有些輕靈的。

與這樣一種「有趣」的閱讀體驗相關的，是我對錢先生治學旨趣的判斷。我以為，錢氏之學，主要是為了求「趣」，錢氏有廣為流佈的一段關於學問的名言：

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64]

這一說法，固然主要是貶斥「朝市之顯學」，強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不過，「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這些用語，多少也突出了學

問的個體性。或者說，這一簡單的表述強調了學問應當是「爲己」的。而本文第一部分引述的蔣寅的論說，正強調「大師」需「爲人」，錢只夠稱「爲己」的「博學家」，尚不夠稱「大師」。

最後，不妨將錢先生與一位公認的大師——陳寅恪稍加對比，以結束本文。

陳、錢之間，雖然治學領域相差頗大，但因爲在近二十年，這兩位學者得到驚人的世俗聲譽，而且他們在學問的淵博精深上，也確實罕有匹敵，所以常常被加以比較。上文引述的蔣寅、龔鵬程和劉皓明的評論文章，都在討論錢鍾書時將陳寅恪帶入進行比較，除了龔鵬程以外，蔣、劉都認爲陳比錢具有更大的學術價值。從學術傳承和影響的角度來說，這是可以成立的。

質言之，首先，錢氏爲學的特異以及其好說不好做，使得後來人難以學習錢之治學；其次，錢氏少大判斷，不甚關注大問題（除了那個最大的問題——古今中西之「同」），而陳氏則多大判斷，其中古史研究的許多具體論斷已被後來學者推翻，但他的大判斷帶來的角度（宗教、地域、民族等等）在中古史研究上，卻啓迪了無數後來者；更重要的是，錢氏的治學，從根本上還是沿襲了集部之學的路數，只是將這一路數的範圍擴張到盡可能大，而陳氏的治學，卻在史學上做到了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討論科學史時提出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65]這一點，奠定了陳寅恪無法撼動的學術史地位。如果以「範式轉移」作爲「大師」的標準，錢鍾書確實不能被稱之爲「大師」。

在學術傳承和影響之外，錢、陳之爲學，恰恰也有着輕重之別。陳氏論著背後，往往關懷着中國的民族、歷史、文化，而且常有現實指向；錢氏論著，背後最大的關懷是人情思理之「同」，雖然極大，卻與現實並無太大關涉。閱讀陳著，我間或能感受到文字背後的憂患和深沉；閱讀錢著，我卻常常透過文字「看到」錢先生在發現一條又一條材料之後的歡樂。將陳氏所堅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加以比較，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二人爲學的輕重之別。

所以，如果依照劉皓明所持的那一厚重的德國哲學標準，錢鍾書的學問確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即使在細部的論述上，劉皓明並不完全準確。

但是，學問顯然不應該只有一種評價標準，陳寅恪式的厚重的學問，值得所有人敬佩，但錢鍾書式的輕靈的學問，也應該獲得一大批人的喜愛吧，至少，錢鍾書向我們展現了一種學問的可能性，而且，他的展現是極有趣的。

## 後記：

本文寫就於2013年，後收入2017年出版的《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李浴洋編，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此據作者修訂之文稿。文中涉及的錢鍾書先生中外文筆記出版等事，在2013年之後均有推進。而有關錢先生的研

究，更有不少重要論者出版（如土水照先生《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等），這些都是本文未及參考的。

\*本文初稿為2013年香港中文大學陳平原老師課上的作業，完成前後得到業師張健教授和授課老師陳平原教授的多番指教。2015年11月，在「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會議上，評議人王達敏教授、發表人張治博士等先進又對本文之刪節稿有所匡正，謹此一併致謝。

[1] 前者如對陳寅恪「不古不今」這一自述的詮解；後者如對王國維自沉原因的探討、對陳寅恪49年之後對中共及國民黨臺灣政權的態度的爭論。

[2] 蔣寅曾在1990年《文學遺產》第4期發表〈《談藝錄》的啓示〉一文，以肯定性的評價為主，因為關懷領域的相近，（蔣在唐詩研究上用力極深，後來轉向清代詩歌、詩學研究，寫此文的90年前後，他尚未大量發表有關清代詩歌、詩學的論著，但已很有興趣，而《談藝錄》所談的，正是唐宋以降的「詩」與「詩學」，故曰「相近」。）所以能談出許多細緻的好處。之後「錢學」研究聲勢烜赫，蔣寅又作〈在學術的邊緣上〉一文，重點談錢的限度，似乎與〈《談藝錄》的啓示〉一文態度相差較遠，實際上二文乃是一貫，前文重點在限度內談錢之重要；後文則重在指出錢之「有限」不應被誇大。當然，這兩篇文章因為應對的形勢不同，語氣上差異頗大。這兩篇論文都收入氏著《學術的年輪》（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

[3] 蔣寅指出：「錢鍾書的學問，可以淵博精深四字概括之。《管錐編》代表着淵博，而《談藝錄》則體現了精深。淵博在內容，精深在思致。錢鍾書的學問，在我看來，不只是一通知識，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種境界。不是王國維的那些學問境界，而是近於天台定慧雙修、頓漸並舉而至開悟的那種境界。所以它不能僅以淵博的學養和專靜的功夫來衡量，還必須加上超妙的靈悟。」（〈《談藝錄》的啓示——錢鍾書先生的學術品格〉，《學術的年輪》，頁173-174。）所謂「淵博的學養」、「專靜的功夫」以及「超妙的靈悟」，確實是錢氏為學最重要的三個面向。

[4] 〈《談藝錄》的啓示——錢鍾書先生的學術品格〉，見《學術的年輪》，頁177。

[5] 以上引文分別見〈《談藝錄》的啓示——錢鍾書先生的學術品格〉與〈在學術的邊緣上〉，《學術的年輪》，頁184、189、190。

[6] 〈錢鍾書與廿世紀中國學術〉，收入氏著《近代思潮與人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7] 「一是唯物論，二是清末『同光體』尊崇宋詩之後的反激心理；三是一般人對宋詩的通俗意見。」見《近代思潮與人物》，頁391。

[8] 分別是「誤記」、「缺徵」和「錯釋」，這幾點錯誤就導致了錢氏多有「謬判」，龔鵬程還專門對錢氏名文〈中國詩與中國畫〉作了若干分析，說明錢之「謬判」。

[9] 見前揭《近代思潮與人物》，頁394。

[10] 雖然在錢鍾書早年為李高潔（C. D. Le Gros Clark）英譯蘇東坡賦所寫的英文序言'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中，錢氏對宋代文人和文學負面評價稍多，但這篇序言在整體評述宋代文人和文學後，濃墨重彩地強調蘇軾的高超和特異。對東坡的評價這是這篇序的中心。所以對宋代文學的負面評價。

應當視作一種「鋪墊」和「反襯」。此文收入《錢鍾書英文文集 (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5年), 頁43-52。錢鍾書在《談藝錄》中對宋詩也有很多論說, 開篇就宏觀比較唐宋詩, 但並未明顯崇唐貶宋。所以, 《選註》之〈序〉中的這一態度, 應當主要與「人主」之好尚有關。

[11] 錢先生自己在「文革」後也坦言他引的只是「常識」, 這是余英時的回憶, 參看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收入氏著《現代學人與學術》(《余英時文集》第5卷,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年), 頁383。

[12] 關於錢鍾書的宋詩研究, 王水照結合錢氏手稿, 近年多有闡發, 其說較為全面而扼要, 參看氏著〈錢鍾書先生與宋詩研究〉, 載《文匯報》, 2006年4月2日; 以及王水照、侯體健〈錢鍾書宋詩研究對治學的啓示〉, 載《光明日報》, 2013年2月27日, 也刊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2013年第2期。

[13] 參看張隆溪〈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紀念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 刊《書城》2010年第3期; 此文也以〈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 兼評當代學風〉為題, 收入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錢鍾書教授百歲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2011年)。這一研討會在2009年舉行, 所以張氏在會上宣讀論文的時間在《書城》刊發論文之前。此文又入氏著《一叢集》(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1年)。這裡用《書城》所刊登的文本, 張氏此文中對龔鵬程的駁正在《書城》頁12-15。

[14] 見《近代思潮與人物》, 頁395。

[15] 參看李澤厚、劉再復〈五四「五說」〉, 此文為劉再復《共鑒「五四」——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香港: 香港三聯書店, 2009年)一書的〈代序〉, 見頁9-10。

[16] 參看前揭〈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

[17] 參看劉皓明〈絕食藝人: 作為反文化現象的錢鍾書〉, 收入氏著《小批評集》(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 頁253-262。

[18] 錢先生在清華大學就讀的是外國語言文學系(簡稱「外文系」或「外語系」), 授課教師如吳宓、葉公超、溫源寧等皆主攻英語文學; 而報考留英庚款時, 錢先生所報志願即「英國文學」, 也是當年(1935年)被錄取的24位考生中唯一一位以英國文學為專業的。關於錢鍾書的求學經歷, 參看〔美〕胡志德著、張晨等譯《錢鍾書》(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0年), 頁4-8; 張文江《營造巴別塔的智者: 錢鍾書傳》(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年), 頁12-41; 李洪岩《錢鍾書與近代學人》(天津: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7年), 頁22-41、66-76。至於在牛津大學的學習, 前揭諸種傳記都只提到錢進入牛津大學之Exeter College, 未涉及其系科, 對錢之修課, 也只根據楊絳以及錢之親友的有限回憶, 有一些模糊的描述。不過, 錢鍾書在牛津大學取得學位(B. Litt)時所作的畢業論文是'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 Century'(〈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 可以說, 錢的整個高等教育求學經歷, 都圍繞着文學。下文涉及錢鍾書之教研工作, 也請參考上述幾種書, 不再一一注出頁碼。

[19] 錢鍾書在《談藝錄》開篇之前寫此書之源起, 就提到了冒景璠「督余撰詩話」, 又將此書視作與論詩文專篇的論文為「表裏經緯」的「詩話」。參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 頁1, 這一段文字在1948年出版的《談藝錄》中即有。關於「詩話」, 下文還有討論。

[20] 這裡的「文史哲」當然是現代學科的概念, 與傳統本有的「文」「史」諸概

念不同。

[21] 關於這一問題，朱剛老師在研究唐宋「古文運動」時有許多透闢的分析，參看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尤其是該書第二章第四節〈「周程、歐蘇之裂」與宋代士大夫文學〉。

[22] 陳平原老師在《中國散文小說史》之第五章〈桐城義法與學者之文〉，尤其是該章第四部分〈學者之文〉中，對這一問題有比較簡而有法的敘述，參看《中國散文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7-182。同時，《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一書通過九家具體個案的討論，更詳盡地展開了這一問題的方方面面。

[23] 強調「智識主義」在明清思想史中的重要，並從「內在理路」解釋清代學術史和思想史，是余英時的創見，相關文章集中收錄在氏著《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傳統社會，不論「道問學」吸引了多少讀書人，「尊德性」在「道問學」面前永遠具有優先性和崇高性，所以不論清代學術和思想中有多麼強的「智識主義」，清代學術和現代學術仍然有着巨大的鴻溝：那就是「道」永遠籠罩在清代讀書人之上，儘管許多讀書人並不真正醉心於道。在這一點上，張汝倫對余英時的研究有比較嚴厲的批評，參看張汝倫〈以今度古的詮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研究獻疑〉，收入氏著《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29-562。上文提及的「周程、歐蘇之裂」，也是在「道」的籠罩下的「文」、「道」側重不同，並非絕然的分裂。

[24] 梁啟超、胡適和錢穆等對清學史的檢討，多少都在揭出中國學術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自然而然」。

[25] 余英時就將「中國傳統學術系統在清末的最新面貌」概括為「經過考證方法洗禮之後的『四部』之學」，參看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收入氏著《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43。余氏在此文中對作為對象的「四部」和作為方法的「考證」的分析值得參看。

[26] 按照傅斯年的看法，史學或許還不應該歸入人文學的範疇，而應該成為科學，參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12。

[27] 清儒雖然講求「道問學」，但畢竟還處於馮友蘭所謂之「經學時代」，所以運用考證方法治學，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仍是經學。而近現代社會走出「獨斷論」、進入「後經學時代」（這是高瑞泉喜用的說法）之後，史學變成了核心。對於近現代史學地位的提升、史學與考證學的關係，羅志田在相關課題上有長期的關注和大量的創穫，參看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02-375。還可參看：氏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之〈引言〉，頁1-24；以及氏著《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的第三、第八、第九部分（尤其是第九部分〈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

[28] 當然，「文學史」成為文學研究中的「顯學」，還與教育有關，這方面陳平原老師已有大量宏觀的和具體的研究、論斷。

[29] 按照韋勒克（Rene Wellek）的說法，這樣的研究都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exterior research/study），而錢先生本人則將這樣的文學研究稱為「實證主義」、「嚴肅的『科學的』文學研究」，參看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1978年）收入氏著《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國/ (1979), 收入氏著《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2年), 頁179。

[30] 錢鍾書〈釋文盲〉, 收入氏著《寫在人生邊上》(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2年), 頁48。

[31] 這是錢先生1978年9月赴意大利參加歐洲漢學家會議所提交的論文, 參看前揭《營造巴別塔的智者: 錢鍾書傳》, 頁219。可以稍加注意的是, 余英時曾回憶, 他在與錢鍾書交談時, 話題涉及馬克思, 錢特意提及馬克思私生子的事情, 余對此頗為奇怪, 他對此的推測是: 「他是借此故事向海外的訪客表明: 他從來沒有奉馬克思作聖人, 也不信仰馬克思主義。」這一推測得到了史華茲的同意, 參看余英時、陳致《余英時訪談錄》(北京: 中華書局, 2012年), 頁153-154。余氏的這一推測頗合情理, 所以, 錢先生在「文革」剛剛結束後, 出國開會提交的報告中, 可能也會有一些爲了向外國學者表明自己立場和態度而刻意言之的話, 這是我們讀這篇論文時應當留意的。

[32] 《人生邊上的邊上》, 頁179-180。

[33] 余英時就記錄了在關於白居易兩句詩的細節問題上, 錢對陳之考證「不以爲然」, 參看前揭〈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現代學人與學術》, 頁381。

[34] 前揭〈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現代學人與學術》, 頁381。朱子之語, 爲陳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卷所引第一句, 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年), 頁183。

[35] 陳寅恪關於「詩史互證」的研究, 歷來得到很高的讚譽。不過, 如果細察陳氏對於詩歌的解讀和使用, 他主要還是用「詩」來解決「史」的問題, 在解決的過程中, 自然涉及對詩歌語言虛實的分辨, 涉及對詩歌撰作背景和詩人生平的瞭解, 於是在使用材料中也爲詩歌讀解提供了不少外部材料, 「史」也就爲「詩」服務了, 但這一服務仍然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 無怪乎錢氏會如此不滿。

[36] 收入《人生邊上的邊上》, 頁92-109。

[37] 見張健師〈《中國文學小史序論》與錢鍾書的文學觀〉, 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此文圍繞〈中國文學小史序論〉, 對錢先生的文學觀、文學史觀作了周密而集中的討論, 探討了「錢先生對於文學、文學批評、文學史以及中國文學史的一些基本觀念」, 下文對錢先生文學觀的敘說, 主要概述此文而成。

[38] 錢先生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對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也有明確的界定: 「一作者也, 文學史載記其承遺 (genetic) 之顯跡, 以著位置之重輕 (historical importance); 文學批評闡揚其創闢之特長, 以著藝術之優劣 (aesthetic worth)。一主事實而一重鑒賞也。相輔而行, 各有本位, 重輕優劣之間, 不相比例。」(《人生邊上的邊上》, 頁93。)也就是說, 「文學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並無必然聯繫, 文學史重在探究作家作品的傳佈和影響, 這是偏於客觀的; 文學批評則要指出作家作品在審美上的高下得失, 偏於主觀。

[39] 古人作詩文, 未必直陳自己的學習模範, 此時能否僅僅根據文本進行判斷, 便十分對研究者的功力有很高的要求。陳尚君老師在2013年4月18日10:30發佈的「新浪微博」中回憶他的同學黃寶華1964年報考錢先生研究生的經歷, 當時的「題目是一百句古人的詩, 要你說出屬於那個流派」。(微博原文: 「錢鍾書招生 我昔日研究生同窗黃寶華兄, 徐州師院畢業, 英語不錯, 1964年報考過錢的研究生。題目是一百句古人的詩, 要你說出屬於那個流派。最後當然是沒有人錄取。»)這裡可能有錢先生不願招生的遊戲態度, 但這種考法, 卻與錢對文學史研究的要求頗爲一致。

[40] 張隆溪曾對《管錐編》開篇之「論易之三名」作較爲細緻的分疏, 見前揭



〈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書城》頁6-9。

[41]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談藝錄》，頁3。

[42] 「且又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談藝錄》，頁4。

[43] 「格調之別，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談藝錄》，頁8。

[44] 這在《管錐編》中更為明顯。《管錐編》涉及的經史子集重要著作，許多清代一流學者已先著鞭，多有註疏申說，錢先生對於他們的成果，或參考引用，或補正發揮，當然也有一些發揮失當之處，這方面的具體例子，可以參看傅傑老師〈《管錐編》稱引段玉裁、王念孫說述論〉，收入前揭《錢鍾書詩文叢說》，頁227-248。有趣的是，艾朗諾發現，「錢鍾書對清代學者最不滿意的一點是，他們評估古人的時候，往往過於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審視個人的整體言行，以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同時代人的評價」。參看艾朗諾〈脫胎換骨——《管錐編》對清儒的承繼與超越〉，收入前揭《錢鍾書詩文叢說》，頁215。也就是說，在討論「人」時，錢先生是要把各種可能的因素都納入進來討論一個人的，而不僅限於「正式的著作」（相當於注42的引文中所謂的「一集」），所以，錢先生完全是知道政治社會環境對個體的「人」的重要影響的，只是這已經不再是關乎文學的研究了。

[45] 所以錢先生對「系統」總是抱有疑慮，這和他以文本為基本單位，注重個體性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錢氏的疑慮在〈讀《拉奧孔》〉一文中有一較為明晰而具體的申說，前揭張隆溪與張健師之論文對此都有徵引，此處不再專門引用。

[46] 前揭〈在學術的邊緣上〉，《學術的年輪》，頁192。

[47] 參看《管錐編》論《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六六則〈全後漢文卷八九〉之「『樂志』於山水」部分，見《管錐編》第三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304-309。必須說明的是，我雖然喜愛閱讀錢先生的論著，但《管錐編》太過浩繁駁雜，常常讀時只能一知半解，讀後即忘，對於錢先生在《管錐編》中的許多學術論斷未能體會，這一例子，因陳平原老師在專著中有徵引和發揮而印象較深，參看前揭《中國散文小說史》，頁76。《中國散文小說史》一書中多處徵引《管錐編》，所引的大多是錢先生的精彩論斷，此處只舉這一例。

[48] 作具有綜合性的宏觀大判斷，往往需要韋伯（Max Weber）所謂的「理想型分析」（ideal-typical analysis）的辦法，而這一辦法與錢先生之重文本和賞鑑體悟是衝突的。關於「理想型分析」，參看林毓生〈問題意識的形成與理念/理想型分析〉，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4期（2004年12月），也收入何炳棣等《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上冊）》（臺北：允晨文化，2006年），頁397-421。

[49] 參看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80；以及余光中〈新儒林外史——悅讀錢鍾書的文學創作〉，收入前揭《錢鍾書詩文叢說》，頁171-185。

[50] 轉引自前揭《錢鍾書與近代學人》，頁19。

[51] 參看歐陽修著，鄭文校點《六一詩話》，合刊於《六一詩話·白石詩說·滄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5。

[52] 由郭紹虞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系列便點校了大量詩話，按照今天的觀念，這些詩話確實都是「專著」。同時，明清兩代的詩話，尤其是清代的許多詩話中，「學」的成分確實很重，有的詩話（如《薑齋詩話》）的作者，本身就是通達的學人（王夫之）。

[53] 《談藝錄》，頁1。

[54] 目江榮祖〈惠東與補償·試探《談藝錄》與《管錐編》的寫作背景與心

[54] 元江采臣《愛心齋集·賦外《吹雲錄》卷《白雲端》的寫作背景心情》，收入前揭《錢鍾書詩文叢說》，頁286。

[55] 錢先生在〈序〉中特意注明了「二西」的出典，不過據我的閱讀體會，所謂「二西」，當指「西天」和「西洋」，也即佛教典籍（這方面因為錢先生不通梵文，所讀的都是翻譯之作）和歐美語文材料。

[56] 《管錐編》之第一冊在1979年出版時，〈序〉中說明：「初計此輯尚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寫定各卷中偶道及『參觀』語，存而未削，聊為異日之券。一九七八年一月又記。」見《管錐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商務印書館後來出版的三冊《容安館札記》和卷帙浩繁的《錢鍾書手稿集》（包括《中文筆記》、《外文筆記》，尚未全部出版）裡包含了這些未完成部分。

[57] 據楊絳先生敘述，錢先生留下了大量外文筆記，商務印書館宣稱還將出版錢鍾書外文手稿集。

[58] 前揭〈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書城》頁6。

[59] 參看張隆溪〈漢學與中西文化的對立——讀于連先生訪談錄有感〉，刊《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于連之批評也轉引自此文。

[60] 參看于連〈答張隆溪〉，刊《二十一世紀》1999年19月號。這之後張隆溪又在《二十一世紀》2000年2月號發表〈無咎者言〉回應于連。這三篇文字都收入張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13-137。

[61] 這就可以理解，為何在《管錐編》開篇，錢先生頗有些盛氣凌人地重點批評黑格爾（Hegel）。這既是因為他具備這個自信，也是因為黑格爾過於強調中西語言之異，並由此論中西思維不同，這種論點，在錢先生看來，是有害於人文學術的研究的。〈論易之三名〉的第一段最末的總結性言論，既有一絲體諒，又稍帶譏諷，但最主要的，還是濃濃的惋惜和遺憾：「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管錐編》第一冊，頁4。黑體為我所加。

[62] 這自然也可以從反方面提出批評，劉皓明就認為，《談藝錄》的「補遺」完全「不涉及觀點的修正或論證的改進」，進而認為錢鍾書的為學與「技術化複製和信息技術」類似，見前揭《小批評集》頁256。這似乎是沒有細讀《談藝錄》的「補遺」而得的結論，因為錢先生在一則文字中往往多有轉圜，涉及若干微觀問題，所以「補遺」裡既有一些修正，又有對原判斷的擴充，或進行更為細微的辨析，只是因為《談藝錄》中常常在「尋同」，所以「補遺」對原判斷沒有大的更改，是可以理解的。

[63] 前揭〈在學術的邊緣上〉，《學術的年輪》，頁188。

[64] 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鄭朝宗的論文〈錢學二題〉中，刊《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鄭氏在這段文字上加了引號，故而這段話一般被認為是錢鍾書之語。

關於科學史上之「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見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中譯見T.S.庫恩著，李寶恒、紀樹立譯《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並參看吳以義《庫恩》（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以「範式轉移」論說中國現代人文學之嬗變，首推余英時，參看氏著《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本文原載《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感謝陳特老師授權發佈。】

编辑：汪宇航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吴真 || 协作与刺激：七十年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